

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

导师：侯仁之 作者：司徒尚纪

海南岛为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又是我国最大的一块热带区域，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历史上在政治和民族关系方面也有别于大陆。但过去开发所产生的问题和后果很严重，如不加以整治，则有继续发展之势。因此，在当前大规模开发海南高潮中，回顾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为必要。本文拟从土地开发的各个因素出发，追溯历代开发过程，阐述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海南自然、经济面貌的变化，探索其利病得失，以供今天建设参考。

一、原始植被和人类早期活动

海南岛在第四纪初期脱离大陆，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未受人类活动干扰之前，是个森林之岛，从沿海到内陆，呈环状地布满不同类型的热带森林和草原。汉初，森林覆盖率达90%左右。这为人类开发提供一个环境严酷，自然赐予丰富的天地。

对岛上广泛分布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研究表明，海南早期开发的历史距今约三千年，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比广东大陆要晚。人类活动以原始的锄耕农业和渔猎为主。

二、历代地方行政建置与政区沿革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国之后，乘势进入海南，把本岛直接置于中央王朝管辖之下。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海南的阶级社会土地开发史。按政区设置和各朝代特征，可划分若干个土地开发时期：

（一）汉到南北朝——地方建置的开创时期。西汉在秦和南越国对本岛经济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初置儋耳、珠崖两郡十六县，开发岛北部、西部和南部沿海低地，传播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方式和文化，迫使黎族先人退入山区。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西汉势力后来撤离本岛，直到东汉马援征交趾，海南才重新有建置，然范围只限于南渡江下游。自此以后又长期为雷州半岛隔海遥领，故此时期海南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处于自治状态。

（二）隋唐——环岛建置开发时期。隋代结束过去遥领自治状态，复置郡县，汉族势力重新伸到南方，奠定海南行政基础。唐建五州二十二县，为海南空前建置，完成环岛开发，并把一些州县深入岛内地，但重点仍在岛东南和南渡江中下游地区。

（三）宋元——全岛建置发展时期。宋除积极经营沿海地区以外，着手开发西部内地，初置镇州。元代以军事进攻为先导，加强东北内地建置，初设会同、定安两县，统治力量进一步深入山区。从宋代开始，渐渐形成从沿海到内地的汉族——熟黎——生黎三个地带的环形人文政治地图。本时期其他各项事业都有发展，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开发的基础。

（四）明清——全面深入开发时期。从明代开始，海南岛从广西划归广东，此后，海南与广东大陆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促进了本岛开发和社会进步。对内海南建置升格为府，辖三州十县，以后相沿不变，成为后世行政划分的骨架。从明中叶开始，封建

生产方式在黎族社会中已占统治地位。由于黎族大量汉化和受编，基层建置深入岛内地，加快了五指山区的开发。

（五）清末到解放前——半殖民地掠夺式开发时期。本岛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帝国主义觊觎和掠夺的对象。由于不合理的开发，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一九三五年在五指山腹地设置乐东、白沙、保亭三县，标志着建置空白地域的消失。

综观本岛历代行政沿革，早期建置增减颇大，宋元渐趋稳定，明代固定下来，为建置上一大转折。建置地域分布，汉唐以沿海及其岛内地为主，宋元深入山区，明清在致力于巩固山区统治的同时，使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民族迁移与人口分布

海南原是个荒岛，它的开发离不开移民。至少在三千年以前，岛上就生活着黎族祖先，但他们并不是本岛原始人类，而是从岛外迁徙来的。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黎族祖先是大陆百越族的一支，与广西壮族有很多共同的亲缘关系，是史前时期由大陆渡海进入本岛的。虽然不能排斥史前时代会有南洋各地的居民迁移岛上，但即使有也是少数或个别现象。

历史时期的移民始于西汉。汉初人口，岛上十六县凡二万三千户，约合13·8万口，每平方公里约4人，密度高于广东大陆。东汉以后，鉴于统治区域收缩，岛上人户统计失之过低。直到隋唐都缺乏可靠数字，唯以隋代十万人口权且可信。

隋末唐初，发生俚人集群向本岛迁移和发展事件。这是海南在越族首领冼夫人势力统治下，由于俚人归附，隋朝皇帝对冼夫人的赏赐，冯冼军队的南征而实现的民族迁移。随着唐代环岛建置的完成，汉在外、俚在内的民族分布格局已见雏型。

直到唐代，汉人移居海南是一种无意识，随机性质的流入，

其后才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样以五代为界线，划分移民史上的前后两个时期。后者以宋代移民高潮的到来为开端，其人数从唐七万增加到宋十万，除汉族以外，迁居本岛的还有占城、阿拉伯等地的回民，他们散布在南部、西北部和东部海岸，构成海南新的民族成份。

元代大力加强政治和军事统治的结果，使人口实际控制数大增，海南甚至居广东境内各路第四位，并以屯田形式强制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口与土地分布关系。

从明代开始，海南人口才有更为可靠的统计，终明大抵维持25万，移民来源渐渐转为以本省为主。此期间还从广西移入苗民，为开发山区增加重要力量。

清初本岛人口一度锐减，嘉庆间陡然上升，达150万，道光时降为125万左右，北部尤其是东北部崛起为人口最稠密之区，与山区人口形成强烈对比。大陆移民达到空前规模，部分移民深入山区。在岛内也出现由东北向西部和西南部远僻地区迁移的新流向。鸦片战争以后，本岛掀起向海外移民高潮，海南后来由此成为广东著名侨乡，此为近代人口地理一大特色。

海南汉族移民，主要来源于福建、两广，次则来于湖南、浙江乃至中原各地。他们在宋以后移入规模最大，明清时达到高峰。至于少数民族移民，回族原先不止一次迁移沿海各地，后一部分被汉化，今唯在南部沿海保留回民区。黎族也发生过从东部、南部向中部山区迁移，他们一般居住在山麓或山间河谷、盆地，而苗族居山顶，形成垂直地带上两大人群。

海南经济落后，决定农村人口占居民绝大部分，城镇不但人口数量少，发展也很缓慢，对地区开发的作用微弱。从汉到唐，城市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分布偏于海河口岸，少数深入沿海内地，但兴废不定，后来多数湮没无闻。宋到鸦片战争期间，圩市、港口和州县治所等多类型聚落不断兴起，特别是圩市，自宋

代出现以后，明清时有长足发展，成为地方物资交流、促进山区开发重要因素。城市也越来越朝综合性方向发展。鸦片战争以后，出现圩市数量锐减，大市镇代替小市镇，人口向大市镇集中的地域转移。

四、土地利用与作物分布

海南土地利用历史悠久，部门结构简单，耕作粗放，开发程度低，虽然历代开发各有不同成就，但其中包含人类不合理的活动也不少，且后果严重，影响广泛和深远。

汉代，这里有男耕女织的耕耘农业和渔猎经济，当地居民种植薯稻麻棉桑果蔗等，饲养牛羊猪鸡犬等禽畜，采集野生植物纤维，从事多种农副产品加工，沿海平原台地被首先利用，渔猎仍是农业重要部门和耕作业补充。海南植棉是我国农史上最早记载，好些野生植物驯化为栽培作物也比大陆要早，反映本岛农业早期取得的成就。然而由于生产水平低等原因，汉代已成为海南缺粮的起点。

隋唐时期，随着环岛开发的进展，土地利用范围扩大，形成环岛作物带。沿海已有两熟之稻，八收之蚕，果品种类繁多，面积也很大，蚕业由西部和北部扩展到东部，土地利用地貌类型除平原台地外，还包括丘陵、河滩、沼泽等，刀耕火种为土地利用重要方式。

宋元时期在本岛土地利用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时不但在作物熟制，品种和农业技术上有不少创新和发展，而且在利用方式，部门结构和地域组织上也表现了新的内容或者趋势。由于占城稻种的引进，海南部分地区的熟制从一年二熟变为三熟，同时又是向大陆传播这个优良品种的基地，小粒花生种的传入，使本岛花生生产量大增，外销大陆。然而出于与过去同样的原因，以薯

为主、稻为辅的粮作结构并未能解决缺粮问题，海南仍需由大陆接济粮食，在经济作物生产上，其栽培面积大增，诸如宋代椰子、槟榔等源源输往大陆，元代棉花由此向北推广。粮食与经济作物用地的矛盾和斗争，成为农业生产地域分异的机制。这时期土地利用得以转机，在于农业技术进步，如金属农具广泛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事业的开展，河滩的围垦等。这促使生产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明清时期土地利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农业生产在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发展水平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业分布日趋复杂和深入，地域分异更加明显。

首先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明末较之明初，总额和人均耕地都增加一倍以上，这为农业分布提供十分有利条件，促使它一改旧观，主要表现一是粮食作物面积扩大，产量增加，缓和过去缺粮局面，二是新作物，包括蕃薯、玉米、大粒种花生、鸭脚粟等的引种和推广，使过去难以利用的大片土地得到开垦，三是经济作物地位崛起和集中种植区的发展，槟榔、椰子更负盛名，大量销售到大陆和海外，形成东部以经济作物为主，西部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地域差异。土地利用另一特点为草场面积增加，以养牛为主畜牧业得到较大发展，大量牛只输入大陆，这标志着土地经长期使用或森林砍伐后所发生的弃耕及植被演替现象。

明代水利事业被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灌溉面积有所增长。依水资源及其利用状况，农业土地利用划分为泉源田、近江田和远江田三个类型。它们在熟制、产量和耕作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这种划分在本岛土地利用史上还是第一次。

清初在土地大量荒芜以后，曾掀起一个规模较大的垦荒高潮，但直到清末，垦田面积仍不及明末水平，而这时人口却扶摇直上，造成人口与耕地相结合的地区分布不平衡。鸦片战争以后，两者差距日益增大，促使人口流动和对土地掠夺式经营，加剧了

生态平衡的失调。

鸦片战争以后，农业传统分布渐趋瓦解，突出表现在粮食生产重新萎缩，不得不依靠洋米解决民食，经济作物地位进一步提高，通过出口贸易与帝国主义的需要和市场供求关系联系起来。本岛实际上成为向帝国主义提供原料的基地和洋货销售市场，由此导致土地利用发生方向道路上的根本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爱国华侨从海外引进橡胶、咖啡等热带经济作物，在本岛各地试种成功和少量发展，这是近代土地利用的重大成果，为本岛后来成为我国最大的热作基地起了先锋和示范作用。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岛上广泛从事土地拓殖活动，包括设立农场、推广良种、兴修水利、采伐森林等，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南土地和环境质量变坏的根源之一。

在人类长期开垦和经营下，形成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到解放前夕，本岛水田旱田和坡地所占比例都很低，而荒山林地居大部分。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和作物组合形态，可划出近代土地利用区域，即东北平原台地稻—花生—热作区，东部和南部平原丘陵稻—薯—热作区，西部平原薯类杂粮区，西北台地丘陵薯—稻—热作区，中南部山地丘陵森林—杂粮区。它们以各自特色，反映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

五、森林变迁的前因后果

土地利用与森林变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海南特殊地理条件下，森林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但土地利用的扩大，必然导致森林的破坏。

汉唐时期，由于汉族的入居，对土地的垦辟日益扩大，加上手工业发展对木材的消耗，原始森林开始被人工植被取代。但其

时人口稀少，森林破坏强度不大，呈现耕地与森林相错杂现象，按开发范围，森林后退现象只在环岛沿海地区发生。

宋代以后，移民日众，黎族比较多地使用刀斧，森林变迁在沿海加剧，并开始转入山区。这时森林破坏的因素，一是移民开垦，二是输出香料木材，三是当地燃料消耗。

明清时期森林的变迁，除了过去有关因素以外，还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刀耕火种为主的苗族的入居以及封建王朝镇压人民反抗斗争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等。这都使森林破坏的方式、规模和速度大大强化了，破坏范围已深入五指山内地，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增加，为历史上森林变迁重要时期。

本世纪初到解放前是海南森林变迁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五十年。由于新式运输发展，公路深入山区，许多过去人迹罕到的林区也被列入开采范围，但以抗战期间日寇对森林的掠夺最为严重，致使森林覆盖率从1933年50%下降为解放前夕35%，相当于元、明、清三朝森林消失总和，为本岛森林空前浩劫。

综上所述，海南森林大面积消失，其原因方式复杂多样，但毁林开荒，耕地上山是主因。由此引起各种后果中。以水土流失和砂丘移动最为严重。

六、刀耕火种及其特点的分析

刀耕火种这种原始的土地开发方式在海南过去被普遍采用，到现在也没有绝迹，为本岛土地利用一大严重问题。

刀耕火种在本岛历史悠久，对土地开发有特殊意义，故其消失比大陆要迟。这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一）地理条件限制，水源充足的河谷平原等面积狭小，干旱台地和山区面积广大，这些缺水土地较宜种植耐旱粗放作物；（二）森林面积广大，足供火烧，（三）地广人稀，有丰富土地可轮番使用，（四）少数民

族生产力低下，水旱田建设晚，耕耘农业不发达，游耕农业较广泛，（五）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恶劣，刀耕火种利于消除瘴气，（六）山区交通闭塞，容易保留落后因素，（七）利于贫苦移民作为谋生手段。

由于刀耕火种流行广泛和长久，故由此产生的危害性和后果特别严重，主要表现在对森林和土壤性质的破坏上。火烧可把不同类型的植物群落直接变为童山或荒地，不但土壤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几乎不能逆转的改变，而且整个生态环境部分出现恶性循环，以致大片土地无法利用。这样的土地在海南历史和现实的开发中到处可见，足以唤起人们深刻的反省。

七、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海南岛开发经历的时间长，但发展缓慢，远比大陆落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很深刻，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端：

（一）、地理位置的偏远和它的相对的独立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这受制于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总方向是自北向南，地区开发的先后顺序也大体上按这个趋势进行。这样本岛历史发展起点迟，低级社会延续的时间也长。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古代大陆人视之为畏途而裹足，先进地区不易超越海洋促进海岛的开发。本岛内部，也由于山脉和河流的相互分割，民族间畛域之见，妨碍民族的融合和进步。这使地区开发长期囿于沿海狭小范围内。

（二）、热带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延缓了开发进程。无论早期中原的还是后来的闽广移民，对海南与其他地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自然条件的认识尚差，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摸索和实践过程。此外，南与北，大陆与海岛之间在土地利用方式、耕作制度作物结构、生活习惯、民族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这都影响到移民的心理状态和开发欲望。在后期，由于过去对土地不合理使用而造成

植被破坏,生态平衡失调等问题,增加了这些土地利用的困难。

(三)、民族矛盾的严重性内耗了开发的力量。海南民族成分错杂,人口地域来源广泛,汉黎、汉苗、黎苗、土客之间及其内部矛盾很多,斗争激烈,经久不息,相互抵消了不少人力物力。少数民族退入山区以后,固守一隅,与外界隔膜,社会停滞不前,这同样延宕了开发步伐。

(四)、治理上失策,导致政治落后和相互分割,妨碍经济发展。封建王朝对海南的经略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采取放任自流政策,轻视和偏见占了上风,由此产生施政上的失策。明朝以前,缺乏统辖全岛行政的机构和首府,州县之间互不相干。各级建置治所,皆环岛摆布,罕有深入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无建置或依靠当地首领治理,留下建置上的空白和产生政治上的落后。

(五)、不合理的土地开发方式及其后果,这是严重的教训。以粮为主的部门结构居首位,单一性粮食生产主宰了土地利用,家庭畜牧业和水产业不发达,本岛自然条件和资源的优势得不到发挥,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未能解决岛上缺粮问题。为了对付人口压力,走了一条毁林开荒、耕地上山的土地开发道路。其结果是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失调,加上长期广泛实行刀耕火种,加剧了它的危害性,不但粮食仍未能解决,反由于大自然的报复而使自身陷于困境。

(六)、综合治理,保护森林,合理开发——历史的启示。海南历史上开发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地理、政治、民族、开发方式等各个方面,就土地利用本身而言,其关键仍在森林。它是本岛农业和生态平衡的轴心。因此,对海南国土的整治,除应按以上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以求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政治得以协调统一以外,保护、恢复和扩大森林,实为维护生态平衡,建立稳定的农业经济结构之要害。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地理系